

留学史丛书

移民与政治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

[法] 王枫初（Nora Wang）著

安延 刘敏 纪俊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留学史丛书

叶隽 主编

移民与政治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

[法] 王枫初（Nora Wang）著

安延 刘敏 纪俊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80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移民与政治: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 1919—1925/(法)王枫初(Nora Wang)著; 安延, 刘敏, 纪俊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6
(留学史丛书)

ISBN 978-7-301-27216-9

I. ①移… II. ①王…②安…③刘…④纪… III. ①留法勤工俭学—史料—中国—1919—1925 IV. ①K2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0235 号

Émigration et politique: les étudiants-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 1919-1925

Copyright © Les Indes Savantes,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书 名 | 移民与政治: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
YIMIN YU ZHENGZHI: ZHONGGUO LIUFA
QINGONGJIANXUESHENG (1919—1925) |
| 著作责任者 | 〔法〕王枫初(Nora Wang) 著 安延 刘敏 纪俊男 译 |
| 责任编辑 | 延城城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216-9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278 千字 |
|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8.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留学史丛书》总序

叶 隽

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始终是居于枢纽地位的推动器。文化的异质性越强,外来刺激的作用力往往越深。故此陈寅恪先生有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①此理不仅适于国人,对人类整体文明同样具有典范效应。而就这样一种文化交流而言,要言之可分两种,一为达摩弘法,一为玄奘取经。前者是主动走出去的“宣经传道”,有一种宣示宗教福音的使命意识在内;后者则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求知向学”,更具追求真理的孜孜之诚。可一旦学术(此处是佛教)中心转移,其情况又变,即为鉴真东渡、阿倍入唐。师、弟位置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但对于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其要义当在“采玉他山”,而非“好为人师”。就此看,我们当然可以为隋唐时代的四海来朝而兴奋自豪,但更应关注由法显至玄奘的求学路径。贞观盛世之际走向西域的玄奘,正充分表现了我民族文明求知于世界的“煌煌大度”。正如当代美国虽为世界留学生汇聚之中心,但走向世界的美国学生也并不少见。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如果说以上表现的，是东方文化范围内以佛教为核心的知识中心场域迁变过程的“代表现象”，那么随着世界场域的整体形成与西方强势背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知识场域转向就是很自然的了。不过，我们还是将目光集中到随着现代科学与学术制度发展而形成的近距离时段中来。19世纪初期的洪堡改革一举确立了德国大学在世界学术与科学场域的中心地位。而有趣的是，“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①。这一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使得美国后来发生了学术革命，并在19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留学史与学术史、教育史（尤其是大学史）密切相连，留学潮的兴起消落往往与学术中心的迁变息息相关；而其背后表现出的政府决策功能和文化意识，往往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少，一个基本事实就是，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而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都是本国的留德学生。

此处仅以中国之求知于世界为例，稍作探讨。近代中国虽然早已有有识之士如容闳等提出派遣留学，并有高层政治领袖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张之洞等予以呼应，但其筚路蓝缕之艰难，仍远超后世想象。故此，从官派留美幼童到留欧船政生乃至轰轰烈烈的留日潮，虽不乏优异人物出现，但往往属于个案现象，就整体言则往往难免或“浅尝辄止”、或“鱼龙混杂”、或“见木不见林”等弊端。而其时中国面临的老大帝国之病与难，使得留学所承载的功利化倾向暴露无遗。早在1910年代，身为留美学生的胡适作《非留学篇》，对留学提出异议：“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度时伤财事倍而功半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②此处表现出的

① [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② 胡适，《非留学篇》，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本，1914年1月。

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其特殊语境中完全可以理解,但却不能作为一种求知向学的纯正心态。到1920年代,潘光旦撰《留学生问题》,继续追问:“我们最先要问的是:年年岁岁有大批留学生出洋,到底有没有一个尽期?”^①对中国留学史深加反思,其致用思绪表露无遗:“我国留学运动,与日本大致同时发轫,但是就成绩而论,便不可同年语了。这是谁的过失?”^②这样一种比较视野的纳入,当然很有参考价值,但中、日近代留学史的成绩或许还有待“百年之后论高下”。毕竟,一时之权力得否,不能作为终极评价的客观标准。我们承认这样的事实,“当山县有朋创建帝国‘皇军’的时候,伊藤博文负责制定宪法,他的幕僚班子和山县有朋一样挤满了归国的留德学生和德国顾问”^③,可问题是,这样的—个留德群体,最后将日本带向了何方呢?

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诚哉斯言!可具体言之,对外来资源究竟是“全盘照搬”还是“批判接受”,这是事关根本的大问题。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浩瀚,并成为世界史上唯一一个作为古国而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就在于其兼收并蓄、博大能容。诚如蒋梦麟所言,“事实上正因为她有伟大的吸收能力,中国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坠”^④。可这样一种吸收能力是如何表现的?它究竟有无特定的规律可循?对当下的中国发展进程来说又有怎样的资鉴意义?若要探讨这样一些本质问题,留学史无疑提供了最佳对象。

自舒新城1928年出版《近代中国留学史》以来,中国的留学史研究可谓勃然而兴;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国内对留学史的研究显然更上台阶,不仅论文数量众多,而且出现了较有分量和深度的著作。对此

① 潘光旦,《读书问题》,上海:新月书局,1931年再版,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19—20页。

③ 有论者进一步认为:“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日本‘向西方学习’,最终落实到以德国为榜样,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参见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第76—77页。

④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载明立志等编,《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336页。

领域作出贡献的学者来自各个学科，不仅基本的史实得到梳理，而且也开辟出很多具体而深入的论题；但此种研究，往往更多关注留学生归国之后的影响与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留学生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留学背景，舍却对其留学经验的深入考察，则异质文化碰撞的具体镜像无从呈现。而留学生在现代中国的角色呈现又是如何与其留学背景（兼及学术与整体）产生深层的思想关联，更是值得具体探讨、很可能生发出思想史研究新义的最佳命题之一。

可喜的是，外国学术语境里对中国留学史的兴趣与贡献也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不但实藤惠秀写出了那部被费正清誉为“资料及例证极为丰富之作”兼“广泛而先驱性的拓荒工作”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①，而且德、法、美等国学人在相关领域也各有贡献，诸如韩尼胥的《1860—1945年中国留德学生的历史和影响》、Stacey Bieler的《“爱国者”或“叛徒”——中国留美学生史》^②、森时彦的《留法勤工俭学小史》等^③，当然其中也不乏华裔学者或留学生的身影，如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④、王枫初的《移民与政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⑤、Ye Weili的《以中国的名义寻求现代性：1900—1927年的中国留美学生》^⑥、孟虹的《中国人留学德国教育（1861—2001）》等都是^⑦。作为一种明显的跨文化群体的研究，在日、法、德、美等不同的学术语境

① 《译序》，第2页，[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② 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Armonk, New York & London, M. E. Sharpe, 2004.

③ [日]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小史》，史会来等译，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Wang Y. C. (汪一驹),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West, 1872-1949*.

⑤ Nora Wang (王枫初), *Emigration et politique: les étudiants-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 1919-1925*.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2.

⑥ Ye Weili,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以中国的名义寻求现代性：1900—1927年的中国留美学生》),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⑦ Meng Hong, *Das Auslands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1861-2001)—Ein Beispiel internationaler Studentenmobilität im Rahmen der chinesischen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Bern, Bruxelles, New York, Oxford & Wien: Peter Lang Europä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5.

里,虽然都关注的是中国人留学史,却显然更注重留学国文化的重要性,这方面是很可与国内学者的视角成“相辅相成”关系的。

既然如此,我们仍不禁要追问,在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学术史反思视域中,推出一套“留学史丛书”,其意义究竟何在呢?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要引进世界学术范围内的他山之石;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推陈出新”,为汉语学界进一步推动留学史研究助一臂之力。具体言之,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尝试,能够兼顾以下几个视角:

一是中国与世界。我们不仅要探索以自身为主体的历史,同样也要关注作为世界文明整体的助推器的世界留学史研究。当中国正在经济、政治诸方面崛起于世界,世界也在以一种超常的眼光期待中国之时,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大国气魄”。譬如说,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即使“身不关己”,也应当予以关注,如以上提及的美国人的德国留学史,就颇值得探究;同样,日本在近现代崛起过程中求知于世界的留学史,也足为中国人留学史之最佳参照。即便是在我们已有相当积累的中国留学史领域,也要特别强调一层“重思”的意义,至少应当注意到涉猎国别的全面性,即由欧洲主要国家如德、法、英拓展到美、日、俄等世界性大国;并进而考察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西方国家如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其他东方国家如印度、埃及的中国人留学史。此中特别强调的是留学史研究与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结合,特别注重国别文化资源的特殊性意义。

二是宏观与个案。在强调国别史研究的同时,在现阶段还需要更多的个案性研究,也就是说要将留学史(包括国别史)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相当数量的个案之深入探究的基础之上。而在具体研究中,也应更加注重个案研究与大学史、学术史研究的融通维度。这既包括对重要留学人的专门研究,如以陈寅恪为个案,考察其留学多国的阅历;也意味着推出新的研究范式,将留学人留学不同国别、不同大学而获得的不同思想资源转化于现代中国文化场域实践过程之中,如以吴宓、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人研究,就应更看重其分别师从白璧德与杜威的背景,而归国后又分别为“学衡派”、“新文化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史位置,将

美国自身思想路径的分化（背后涉及欧洲文化内部异途的世界性思想潮流变更）与中国的思想分化充分结合，将现代中国更具体地落实到世界场域之中去。

三是现代与传统。我们在考察以现代为主体的留学史进程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复归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对思想资源的主动汲取，也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沉入历史”。譬如对于中国而言，更长距离的留学史迹需要仔细爬梳，如法显、玄奘等为代表的留印历程究竟是怎样的？而日本留学僧、留学生的来华历程，同样也值得细加清理。而注意到现代的维度，则涉猎范围既以文化史、思想史为关注中心，同时又更加关注其与社会史、政治史的互动功能，使得单纯的留学史、文化史研究通过思想史这一中介，更密切地与社会史、政治史结合起来。

总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从留学史这一特殊视角切入，提供一种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主要文明成长过程的新的观察角度，或许，可以由此更好地揭示出发现某种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可能。至少可以承认的一点是，舒新城当年所指出的事实至今并无根本改变，即：“现在的中国，留学问题几乎为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从近来言论发表的意见，固然足以表示此问题之重要，从国内政治教育实业诸事业无不直接或间接为留学生所主持、所影响的事实看来，更足见留学问题关系之重大。”^①留学史研究的意义显然并非“无足轻重”。希望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不曾辜负了留学史上那些星光闪耀的前贤巨子！

2009年3月23日于北京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28年，第1页。

目 录

《留学史丛书》总序/1

引 言 法国的华人/1

第一章 双重经历:界定与挑战/9

特殊的移民/10

研究对象的产生/13

史料/26

第二章 法国系列/31

没有前途的青年人/32

如何学习/39

奔赴法国/45

一个系列(une filiere)的形成/59

第三章 留学生还是移民劳工? /70

勤工俭学运动/71

里昂中法大学/87

生存、学习、工作/95

法国印象/115

第四章 政治活动:从抵达法国到“攻击”

里昂(1920—1921年)/125

各个阶段/126

法国交往的作用/132

中国的序曲/140

1919—1921年:明朗化/147

一次法国的五四运动？/154

一个共产党的建立/167

里昂事件/178

第五章 政治行动：1922—1925 年/195

手足敌人：共产党员、无政府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国民党/196

敌人：共产主义者和青年党/214

最后的“大战”？/218

结 论 移居国外与 20 世纪中国的变革/240

附 录/251

在法中国共产党名录（1920—1925）/251

其他人员名录/254

组织、群体的不同称谓/255

人物生平/257

参考文献/264

1. 档案史料来源与报刊/264

2. 著作与文章/269

部分相关图片/288

译后记/301

引言 法国的华人

移民与政治经常并行不悖：在相同的地点，类似的例子似乎无穷无尽。巴黎是意大利烧炭党人密谋活动的地方，也是纳粹主义的反对者和受迫害者短时期内临时避难的地方^①，而越南的反对派则聚集在广东或东京。对立、叛离、迫害和真正或所谓的政治计划都是移民的动因；所有的移民团体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热烈地参与原籍国的政治论战，哪怕当时他们流放的原因仅仅是贫穷或对前途绝望。

这方面的情况没有得到充分发掘。P. Milza 20 年前介绍了一系列关于阿尔卑斯以南意大利人移民法国的文献，他强调这一研究以及文献作者的研究计划都显示出“‘政治’移民与‘经济’移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仅仅在几年前对这两种移民现象研究的区别还很清晰。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的‘政治’移民与劳动移民之间的区别界限是人为造成的，也是特别模糊的”^②。在“那些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中”，他梳理了“政治移民网络和路线的研究”，

① 除巴黎之外，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荷兰、英国、瑞士、美国……或者上海。参见 Jean-Michel Palmier, *Weimar en exil* (《流放的魏玛》)，巴黎，Payot，1988 年。

② P. Milza 主编, *Les Italiens en France de 1914 à 1940* (《1914—1940 年法国的意大利人》)，罗马法国学校，1986 年，第 2 页。

并提出：“它们是否与劳动移民的网络和路线相重合？如果不是，那么又遵从何种逻辑？”^①

这些思考和疑问至今仍然适用于对中国当代移民现象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广义地理解“当代”的范畴，即从19世纪末到现在。在这个时期，华人移民成为大规模的现象。规模有多大还用说吗？海外的华人社团^②，包括移民及其后裔，如今可达2500万到3000万人，是第一代移民的40倍^③。由于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不一，通常用于指代移民居住地的“聚居地”（diaspora）一词显得很不准确，但本书后页仍然使用。移民的目的首先指向华人常说的“南洋”——东南亚半岛与群岛。从19世纪中叶开始，部分华人就迁移到印度支那殖民地、暹罗（今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尽管20世纪下半叶这些地区爆发了解放运动和各种军事冲突，许多人仍然定居在此。从19世纪末期开始，除了南洋，他们越来越多地移民到太平洋的彼岸美洲、澳大利亚和欧洲。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描述分析华人迁移的潮流、动机、网络组织、经济作用或地理痕迹，而只是强调这一内容的重要性和研究中的一些特殊性。

海外华人聚居地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近年来此方面的研究呈显著增长之势，且研究方向和重点不断调整；很少有研究领域经历过如此的拓展和更新。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很多作者很早就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在中国国内主要是围绕移民的能力和命运，在国外迁入地则是围绕他们的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地理分布或治安问题。研究还长期集中在中国主要政治思潮的形成过程中，海外华人对重要政治运动所起到的建设和资助作用以及在共和制度确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对中国政党、历届政府或其政治对手的态度；同样，研究者们也很早就开始对中国政府对待海外移民的态度感兴趣。

① P. Milza（主编），*Les Italiens en France de 1914 à 1940*（《1914—1940年法国的意大利人》），罗马法国学校，1986年，第41页。

② 不区分身份或国籍。

③ Pierre Trollet, *La diaspora chinoise*（《华人聚居地》），巴黎，PUF，1994年。

因此,这个领域的旧文献大多与研究改良或革命思潮的文献,与研究知识和政治的西方化、留学、知识精英尤其是文化和学生精英的研究文献混同在一起。同盟会是孙中山及其革命战友创建的反对清王朝的革命组织,也是此领域的经典案例,研究文献格外丰富。大多数研究1911年辛亥革命的历史学家和撰写孙中山传记的所有中西方作者,从C. M. Wilbur(韦慕庭)到M. C. Bergere(白吉尔)都充分发掘了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最初的事业很大部分是由马来西亚、印度支那或火奴鲁鲁的广东人,以及定居在美国西海岸的华商和留学欧美的中国留学生资助的,尽管这些人内部存在论争,有时还是激烈的冲突。此外,直到1920年代一直受流亡者青睐的国家日本更是得到特别关注,梁启超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巨大的人士均流亡日本,对日本的分析研究也尤为深入和细腻^①。

移民中的经济问题起初并未得到过多关注,从上世纪初开始才成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华工,即农业劳动者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协约国雇佣的苦力,他们的生存和劳动情况得到详细的挖掘。相关专题很快发表了文章、著作,特别是资料汇集。陈达^②关于中国移民在种植园、农田或铁路工作情况的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

近些年来有关研究的变化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题的转移;另一方面是华人群体本身(或华人后裔)在研究中的参与,这种参与对主题的变化也是不无影响的。其动因与中国的政治形势,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这与其他领域的中国研究相同。除了传统的问题——移民去国原因与影响,海外资助的规模、性质与作用,与接纳国社会的关系等,新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特别是社会学文献的影响,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题目,如对移民社会网络

① 主要参见 Akira Iriye(入江昭)的研究。Akira Iriye 主编,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中国人与日本人, 政治与文化互动中的论文集》), 普林斯顿, 1980 年。及 Douglas R. Reynolds(任达), *China, 1898-1912, The Xinc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中国, 1898—1912, 新政革命与日本》), 哈佛, 1923 年。

② Chen Ta(陈达), *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中国移民与特殊的劳动条件》), 华盛顿, 1923 年。

策略、性质和功能的关注等。此外，世界范围的人文科学场域还涌现出一批有关跨种族、跨文化和对身份的研究。

在这些研究和思考中，华人移民自身和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后裔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迁入国的融入程度足够深入，可以认同当地理论关切和问题的构建，同时又身处族群紧张关系和身份质疑的困惑中。他们的母国不再积贫积弱任人摆布，而是作为一个大国不断崛起^①。杜维明^②认为，海外华人与世界汉学界以及中国政府一起成为宣扬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三大主要力量。持续一个半世纪以来，伴随着对中国和海外华人关系性质的探究，重新激活了界定“中心”和“边缘”有机关系的论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海外华人群体比中国本土更好地保存了“传统”身份和文化性的认同。在中国“民族圈”的某些部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也加入其中，这些地区的华人与海外华侨比大陆的华人更多地保留了传统中华的痕迹。

我们同时应该把197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政策与中国移民祖籍地（侨乡）引起的新研究关注直接联系起来。具有移民传统地区的形成与大规模移民潮本身一样时间久远。在很长时期内，侨乡的地理分布是稳定的，移民主要从广东、福建、其次浙江三省迁出。但情况并非静止不动，最近的趋势表明移民迁出地和路线更加多样。

以上简要涉及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许多研究计划也正在进行，在此我们不准备用几行字做文献综述，只是想强调一下此领域对政治议题的遮隐——当然那些显而易见从政治角度出发对北京政府举措和意图进行的分析除外。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吗？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

① 这里要特别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中华”圈的发展，实现中国复兴的吸引力和经济一体化，有利于解决统一的老问题；另一方面是有关“中国化”的研讨会和思考。参见美国人文学会会刊 *Daedalus*（《代达罗斯》，剑桥，Mass.）120 卷，1991 年春第 102 号，有关“今日作为中国人的意义变化”（*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的辩论。

② 杜维明，“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文化中国：作为中心的边缘》），*Daedalus*。

观察者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现状或未来,尤其是不久的未来似乎比过去更加感兴趣。可以看出这是 1980 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共产党摒弃第三国际时代政治遗产等一系列事件的正常结果。

苏联解体后,对中国政权的质疑始终围绕着一个基本问题:苏联政权存在了几十年,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可以永远统治下去,却一下子崩溃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还能继续执政吗?中国的政权体制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

关于革命的主题慢慢隐退,而这一主题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的编写,并将中共置于研究的核心。Lucien Bianco (吕西安·比昂科)在一部经典著作中追溯了中国革命的起因,并分析了中共取得执政权力的成功因素。当时的历史研究都是围绕革命的主题。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重点放在 1949 年革命和中共政权的合法化。在国外,冷战思维统领的历史编纂主要是探究大动荡或称解放运动的原因,不同的立场使用的词汇也不同。

中共党史在 1970 年代前是历史研究的中心,如今则不太引起人们的兴趣。中共的历史作为遗迹得到分析,其准确的性质很难界定。从 1921 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到“文化大革命”末期最后的化身似乎都已经得到充分挖掘。共和国时期的整个历史都已经被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审视过了,那么为什么还要追溯过去呢?

不管怎样,革命主题的隐退让我们得以用另一种方式解读中国的 20 世纪。与“中国革命悲剧”灾难性和夸张的视角不同,这种解读将中国革命置于更久远的历史时期,而不仅仅以 1950 年代的政治和军事胜利者为核心。该变化影响到对共和国整个历史的编纂思路进行重新审视^①。重新审视的内容有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执政国民党的行为以及南京政府的性质。重新审视的视角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平反,还追溯到军阀混战时期,与清末中国社会的缓慢军事化进程相衔接。而过去人们认为军阀的行为对中国的经济现

^① 参见 *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伦敦,1997 年 6 月,第 150 页,专刊 *Re-appraising Republic China*(《重新评价共和国中国》)。

代化纯粹是灾难性的。

可能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焦距的变化也是从另一种角度探讨政治本身，探讨国家和社会的平衡关系，以及公民社会至少是公民社会雏形的出现。在更为久远的历史时期，共和阶段可以与清朝的改革连续起来；将20世纪置于更长的历史时间段可以更加充分地挖掘清王朝最后几十年的征兆以及那些改革过程中中国出现的论争和努力。

例如，孔飞力对清朝末年重新出现的这些趋势进行的思考就很有意义。^①他提出“中国宪政计划的更迭”，强调了18世纪以来中国的变迁与外部世界整体发展趋势之间的联系，包括人口压力、贸易网络或移民活动；人口迁移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自1700年开始的中国人口的急速增长（从1700年到1850年增加了两倍）大大加快了这一趋势，其产生的影响是矛盾的。孔飞力以富有挑战性且不同寻常的方式提出了以下原则：“近代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具有相同的特征。”

此外，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关系，出于最近的历史原因以及机构西方化、动员全国民众和保证税收控制的需要，必须有一种与清帝国时期相决裂、彻底外生的组织。为使农村的剩余生产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工业化，政府让过去的乡绅精英不能发声，挤压他们的自主空间，并将封建时期甚至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未曾实施的中央集权命令强加各地方。Kuhn指出，人民公社作为自给自足、自负其责的劳动单位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完全取消了市场，而农村通过市场才能找到农产品的销路（经常是国际销路），对这一点的忽视付出了严重的贫困的代价。时过境迁，但中央集权并未减弱，中国与国际深刻发展趋势的接轨并不完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弱势，伴随着官僚政府内部对民主的争论，还有农村的某种“基层民主”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出现，与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持续匮乏，都意味着民众的期待依然像在19世纪那样仅仅是一种父道主义的家长作风——清王朝统治初期曾实施的父道主义。P. E. Will在孔飞力著作的前言中指出，清王朝如今在人民共和国倒是很

^① Philip A. Kuhn（孔飞力），*Les origines de l'état Chinois modern*（《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源》），P. E. Will译，巴黎，EHESS，1984年。